

地域文化
与
中国语言

张维佳 主编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地域文化 与 中国语言

张维佳 主编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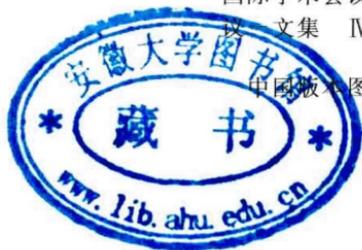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域文化与中国语言/张维佳主编.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4

ISBN 978 - 7 - 100 - 10196 - 7

I. ①地… II. ①张… III. ①区域文化—中国—
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②汉语—语言学—国际学术会
议—文集 IV. ①G127-53 ②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476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地域文化与中国语言

张维佳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196 - 7

2014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⁵/₈

定价:63.00元

目 录

地域文化与民族语言

- 上古 sk-声类考 潘悟云 1
- 颜色词的语言认知研究 黄 行 6
- 朝鲜汉字音和现代韩国汉字音的关系
- 兼论韩语各朝代汉字音的定名 陈文备 严翼相 24
- 汉语与乌拉尔语言同源关系概论 高晶一 36
- 说“颈” 黄树先 91
- 也谈“干栏”的语源 蓝庆元 107
- 文化传播和突厥语中的借词 赵明鸣 114
- 突厥语族语言中的人称一致 司富珍 156
- 青海的多语言环境和语言接触——以“风搅雪”为例 王双成 172

地域文化与北京官话

- 契丹小字汉语音译中的一个声调现象 沈钟伟 185
- 北京官话对古汉语音系的继承 郑张尚芳 206
- 北京话的历史分期及各期音韵文献汇考 冯 蒸 210
- 北京话口语中标记话题的信息属性研究 刘林军 259
- 外来人口习得北京话常用口语词的
- 社会语言学研究 茹 菲 张维佳 274

2 地域文化与中国语言

北京话和普通话轻声、儿化显像模型的测试比较

..... 劲松 王倩 292

标准汉语音系的几个问题..... 严翼相 308

地域文化与汉语其他方言

扬雄《方言》及其研究..... 华学诚 徐妍雁 327

吴语声调的演变及内在一致性..... 刘民钢 353

中亚东干语陕西话语音特点及其溯源

..... [俄]欧赤妮克娃·安娜 张维佳 369

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

——兼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 周及徐 387

从方言区域分布的关联论“一着(著)·tʂə”、“一了·lə”的

历史关系..... 陈卫恒 405

黄孝片及周边方言非阳声韵今读鼻音尾现象分析..... 石绍浪 419

山东方言亲属称谓及其文化特征..... 张洪燕 426

汉字构形的地域变异..... 王立军 440

地域文化与文学语言

地域文化视阈下的方言土语对于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功能探析

——以周立波《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为例

..... 杨建国 秦璐莹 张潇 451

韩国故宫的楹联..... 李光哲 465

后记..... 483

上古 sk-声类考

潘悟云

上海师范大学

李方桂(1971)根据“造”与“告”的谐声关系,提出 $*skh > tsh-$ 。还有精母字“井”与匣母字“刑”谐声,也是这种关系,潘悟云(2000)与郑张尚芳(2003)都提出以下的公式:

$*sk > ts-$ $*skh > tsh-$ $sg > dz-$

但是,也有些人并不认为“造”与“告”谐声,“造”中的“告”在古文字中顶端左歪,如 (申鼎)中的,与 (召伯簋),字形不一样。

“刑”的声符与“井”也不相同:

 (古陶文字征)中的 与 (克鼎)不一样,后者中有一点。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如这些学者所说的那么绝对。

“造”中的字形在一些古文字中,确如这些学者所说,顶端左歪,如:

 (颂鼎)  (申鼎)  (羊子戈)

但是也有一些古文字中的“告”与普通的“告”一样,顶端不左歪:

 (高密戈)  (颂簋)  (睡虎地秦简)

“井”在一些古文字中,中有一点,如:

 (克鼎)  (睡虎地秦简)

但是也有一些古文字中没有一点:

共_甲 308 共_{京津} 302 共_{乙亥鼎} 共_{侯马盟书}

字是用来代表词的，两个不同的字形如果用来代表不同的词，它们就是两个不同的字位，不管它们之间是多么相似，也不可能互用，否则就是写错字。如“土”与“土”，字形很近，但是不可能把“进士”写作“进土”，也不能把“土地”写作“土地”。几个不同的字形，代表相同的词，而且字形有相同的来源，它们就是同一个字位的不同变体。如“土”与“土”，“杯”与“栝”，“插”与“插”，各属于同一个字位的两个不同变体。

现代文字中的字位与字位变体概念，古代也是如此的。所以与，与都是同一个字位的不同变体。

就像音位有自由变体与条件变体一样，字位也应该有这两种变体，条件变体只出现于特定的语言环境。有些字形只出现于某些地区，那是地域变体。有些变体可能代表不同的形态，我们把它叫作形态变体。潘悟云(1987)提出了形态的语音相关概念。设某词 A 有形态变体 A₁、A₂，A₁ 和 A₂ 语音形式一定互有联系，它们之间或者有某种内部屈折关系，或者是附加词缀不同。这种语音联系叫作语音形式的形态相关。两个字位变体如果在语音上形态相关，它们就可能是形态变体。先举例子说明。

“太”，又作“泰”，是一个后起字，原来与“大”同形，在先秦的文献中“太子”都写作“大子”。读作定母的“大”，是大小的“大”。读作透母的“大”，表示地位的崇高，品质的高尚，它是前一个“大”通过声母的送气、清化，派生出来的新词。古代有很多用同一个字形来代表几个同根词的例子。如“量”，平声为动词，去声为名词。“败”，並母为自动词，帮母为使动词。不过，用同一个字形来代表不同的词，在使用上会有诸多不便。于是，古人就在“大”的下面加了一点，来代表读作透母的那个词，是为“太”。有些后加的符号是有意义的字，如“簸箕”的“箕”，初文就是

“其”，后来为指代词“其”所借用。为了使用上的方便，就在“其”上加“竹”字，成了谐声字“箕”，这样就把两者区别开来了。

我们再来讨论上面从“告”、“井”得声的一组字。这两组字，都有见系与精组两种读音。我们发现，读见系的字，没有变体，变体只出现于精组。上面讨论的“造”与“井”，都是精组字，都出现不同的字位变体。《古文字诂林》中“造”字有 13 个字的声符为歪顶的“告”，有 59 个字的声符为普通的“告”。“井”有 21 个字的声符为变体“井”，69 个字的声符为“井”。但是《古文字诂林》的 231 个“告”字，没有一个歪顶的字形。从“井”得声的见系字中，“形”2 个字，“刑”9 个字，“型”5 个字，其中除了诅楚文中的𠄎，似乎为“井”的变体，其他全部以“井”为声符，下面是一部分例子：

𠄎(空壶) 𠄎(汗筒) 𠄎(古陶文字征) 𠄎(古老子) 𠄎(华狱碑) 𠄎
(古陶文字征)

这个事实绝对不是偶然现象。见系字上古带软腭或小舌声母，是词根形式。精组字来自 *sk- 类的声母，*s- 是前缀。“井”原来可能就有 *keŋ 与 *skeŋ 两读，现代汉语中的“井”来自 *skeŋ > tseŋ，原来的词根形式 *keŋ 后来失去了。古汉越语中的“井”为 gièŋ 就可能借自汉语的词根形式 *keŋ。为了把 *keŋ 与 *skeŋ 区别开来，古人在读作 *skeŋ 的字形中加了一点，成为“井”。“刑、形、型”等字因为声母是 *g-，不带前缀 *s-，所以声符都是“井”。上博简文中“耕”不带 s-，所以写成“井”，“井卦”的“井”带 s-，就写成“井”。后来“井”的两种读音中，只剩下 tseŋ < skeŋ 一种，就只写作“井”了。这个变化大概在汉代。在西汉的古隶中还有写作“井”的，如《马王堆汉墓帛书》、《居延新简》、《河西简牍》、《流沙坠简》。但是在东汉以后的今隶中只写作“井”了（臧克和 2011）。

“告”的情况类似。“造”是精组字，但是古代可能有 *k- 与 *sg- > dz-

4 地域文化与中国语言

两种读音,为了把两个读音区别开来,就把带*s-前缀的字的顶部往左弯了一下,作为标记。后来*k-的读音失去了,只剩下*sg>dz-的读音,字形上就不需要歪顶的变体,只剩下一种了。

但是,既然*sk-是上古的一个声类,而且其中的*s-往往是一个前缀,那么像上面讨论过的“井~刑”、“造~告”之类的谐声现象应该是大量存在的。但是,这样的谐声系列却非常少,这又作何解释呢?

古人造谐声字的时候,要求同一个谐声系列中的字语音相同或相似。但是语音相似,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可能因人而异。例如,大部分的人会认为同部位的塞音是相似的,这就是见~溪、见~匣、溪~匣大量假借、谐声的原因。但是*sg与*k-,有些人会认为相似,这就是“告”与“造”谐声的原因。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不相似,所以*k-与*sk-不太在同一个谐声系列中出现。对于这类字,古人更倾向于用不同的字形来代表。例如“亡”*maŋ与“丧”*smaaŋ,有相同的词根,古人可能认为它们的读音不太相似,就用两个不同的字形来代表它们。所以,我们不能单纯从谐声关系上判断一个字是不是*sk-类的音。从“且”得声的谐声系列是典型的例子,这个谐声系列中没有见系字,似乎不属于*sk-类的音。但是古代的地名“且末”又作“姑蔑”,“且”与“姑”通假,这说明“且”的声母中一定含有k类的音素。而且,从“且”得声的字,常常与见系字构成词族:

徂	假
且	姑
祖	古
置	罟
租	假
阻	格
狙	覈

精母字“酒”是另一个*sk-类的音。从“酉”的谐声系列中,也没有

见系字。但是,“酒”战国陶文作“𩚑”,从“九”得声,可见应该带有音素 *k-。如果没有这个陶文,虽然我们不能通过谐声关系得到 *k- 的信息,但是通过“酒”在现代南方各民族中借词的信息,同样可以得到它为 *sk- 类声母的结论:

泰语	老挝	版纳	德宏	傣拉	龙州	邕宁	武鸣	柳江	布依	侗南
lau ³	khwa:u ³⁷									

侗北	仡佬	水语	毛南	佯黄	锦语	莫语	标语
tau ³⁷	khɣə:u ³	ha:u ³	kha:u ³	la:u ³	l̥a:u ³	l̥a:u ³	lɔ ³

“酒”上古幽部 *-u。侗台语的 -au 来自 *-u, 经过了历史音变: *-u > -əu (仡佬) > -au > -ɔ (标语)。汉语的上声来自韵尾 *-ʔ, 侗台语的调 3 也来自于 *-ʔ (王敬骝、陈相木 1983)。仡佬语的 khɣ- 来自于 *khl-。锦语与莫语的清边音 l̥- 说明前头原来一定还有一个清辅音 kh-, 清塞音后的流音发生清化, 是一个很常见的音变, 如英语的流音在清塞音 /p, t, k/ 后面通常会发成清流音 (Ladefoged 1975)。在大多数的侗台语中, *kh- 失落剩下 l-。所以, 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的原始侗台语拟成 *khl̥uʔ。汉语的“酒”从“酉” *luʔ 得声, 说明有词根 *kluʔ, “酒”是带前缀 *s- 的形式 *skluʔ > tsu。

参考文献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 《清华学报》新 9 卷 1、2 期合刊 (本文参用商务印书馆 1980 年再版本)。
-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敬骝、陈相木 (1983). 《傣语声调考》, 《民族语文研究丛刊》, 昆明: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语文研究室。
- 臧克和 (2011). 《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 郑张尚芳 (2003). 《上古音系》,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Ladefoged (1975). *A Course in Phonetics*,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颜色词的语言认知研究

黄 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颜色是人对可见光的视觉和心理效应,颜色的物理属性是人眼可以感知的 380 纳米至 740 纳米波长的电磁波,因此颜色客观上是一个连续感知系统。但是人对颜色的认知通常要将这个连续感知系统变为范畴感知系统,即将连续的光谱分为若干个颜色范畴,而颜色范畴的分类最直接的反映即语言的颜色词系统,因此不同语言颜色词的比较是语言认知研究的重要领域。

最早研究颜色词语言认知问题比较著名的学说是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也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相对论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结构有无限的多样性,因此一种语言的范畴和定义分类系统为该语言系统所独有,与其他语言的范畴和定义分类系统不同。语言是思维或认知的重要工具,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思维都是通过母语来进行的,即语言中有怎样的范畴分类系统,对客观世界就有怎样的认知范畴。

为验证这一假说的有效性,国内外学界已经开展过多项跨语言颜色范畴分类的比较和测试,但是这些验证都不是语言学的命题和方法,对心理语言学的影响也不大。刘丹青(1990)从词形(单纯词还是复合词)、语义(是否基本义)、派生(能否派生出非颜色义)、能产(能否构成其他词)、词性(形容词性外兼其他词性的程度)、形态(重叠和附加成

分)等词汇学角度对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做了微观的分析,得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是按“黑、白、红、黄、绿、蓝、灰、紫”的顺序和等级排列,属于颜色词的语言学分析,但是所用指标多出于现代汉语的词汇特点,而不能完全适用于汉藏和阿尔泰民族语言颜色词的分析。为此,本文拟以我国汉藏和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的颜色词为例,从语言相对论已证实的任何语言的颜色词都受普遍分布等级制约,运用跨语言颜色词的词源分析和隐喻功能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进一步说明颜色词语言认知的理据。

一 颜色词和语言相对论

语言相对论常被引用的经典案例是伯林和凯(Berlin and Kay 1969)关于基本颜色词(Basic Color Terms)的比较研究。颜色在物理上是可见光谱的连续系统,人们对颜色的心理认知和范畴分类会受其母语颜色词系统的制约。在研究者调查的 98 种语言中,基本颜色词最多的有 11 个,最少的只有 2 个,因此根据语言相对论,使用不同颜色词系统语言的人对客观颜色的认知是不同的。

基本颜色词的分布还有另一层语言相对论的意义,即相同的颜色词范畴在不同语言中的语义空间有可能是不同的。研究实例如非洲的希姆语(Himba)和伯因摩语(Berinmo)都有以下黑、白、红、黄、蓝 5 种颜色词:(Roberson and Davidoff 2000,转引自夏丽云 2009)

语言	黑	白	红	黄	蓝
希姆语	zoozu	vapa	serandu	dumbu	burou
伯因摩语	kel	wap	mehi	wor	nol

通过用 160 只色彩与光泽不同的姆塞尔颜色条测试两种语言人的颜色范畴,发现他们在颜色认知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希姆语和

伯因摩语对颜色分类如下图 1 和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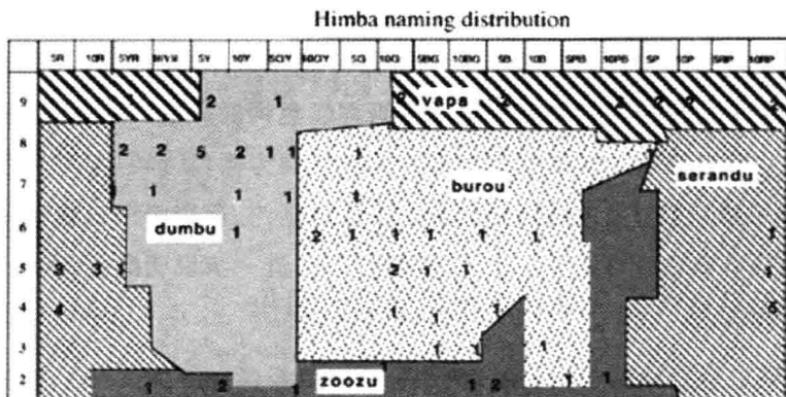


图 1 希姆语 5 个基本颜色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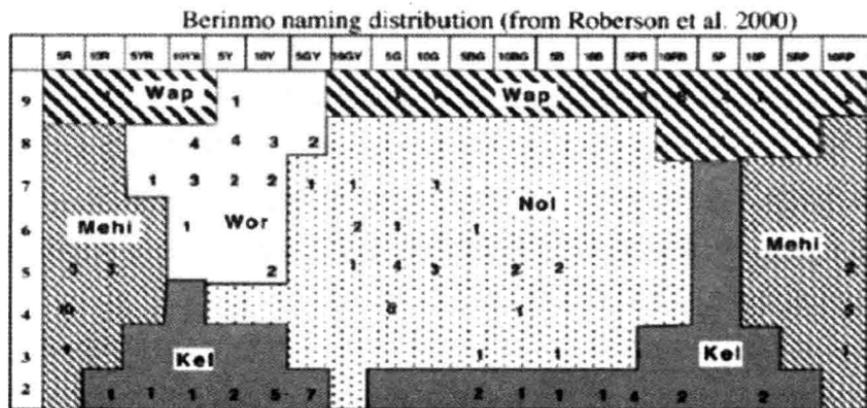


图 2 伯因摩语 5 个基本颜色的分布

另据一项权威世界诸语结构类型分类的数据库(B. Comrie 等 2005)显示,在调查的 119 种语言样本中,基本颜色范畴多少在语言中的数量分布呈两头少、中间多的正态分布,即:

基本颜色范畴	语言数量	百分比
3—4 个	20	16.81
4—6 个	26	21.85

基本颜色范畴	语言数量	百分比
6—7 个	34	28.57
7—8 个	14	11.76
8—9 个	6	5.00
9—10 个	8	6.72
10 个以上	11	9.24
总数	119	100

颜色范畴指通过颜色词反映的颜色的类别,但由于同义词的存在,一种颜色范畴可以由多个颜色词表达,因此一般颜色词要多于颜色范畴。如《说文解字》表红、青、黑、白、黄五类颜色范畴的词共 130 个,红色系有赤、红、朱、丹等 45 词次,青色系有 15 词次,黑色系有 45 词次,白色系有 40 词次,黄色系有 18 词次。(刘晖 2011)当然,如果不包括复合或派生的颜色词,颜色范畴和颜色词的数量差距不会这样大。

表 1 汉、彝、白、纳西族大学生基本颜色语义空间分类

基本颜色	汉族学生	彝族学生	白族学生	纳西族学生
黑色	非彩色	暗色	暗色	暗色
白色	非彩色	白色	暗色	白色
红色	暖色	暖色	暖色	尊贵色
黄色	暖色	暖色	暖色	双义色
绿色	冷色	冷色	冷色	双义色
蓝色	冷色	冷色	冷色	双义色
橙色	暖色	暖色	暖色	杂色
紫色	冷色	冷色	民族偏爱色	尊贵色
棕色	非彩色	暗色	暗色	杂色
灰色	非彩色	暗色	暗色	暗色
粉红色	暖色	暖色	民族偏爱色	杂色

一项对汉族、彝族、白族、纳西族一组大学生的心理试验(张启睿、和秀梅、张积家 2007)表明,由于不同民族的大学生基本颜色的分类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对 11 个基本颜色的分类数不同,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空间维度也不完全相同。汉族有非彩色/彩色和暖色/冷色两个纬度,彝族和白族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空间都有暖色/冷色维度,纳西族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空间则有杂色/单色的维度。以下试验结果说明民族文化和语言对颜色认知的影响,见上页表 1。

二 颜色词分布的等级制约

尽管不同语言颜色词的范畴和数量差异极大,但是颜色词的分布和排序却呈现出超语言的等级共性,即:

黑/白>红>黄/绿>蓝>棕>紫/橙/粉/灰

这个分布顺序是指,凡有某颜色词的语言,必然也有其左边的任何一个颜色词,但是未必有其右边的颜色词。如只有两种颜色词的语言一定是黑和白(或冷色和暖色),三种颜色词一定是黑、白和红,四种颜色词一定是黑、白、红和黄或绿,余可类推;反之,如果有黑、白的语言未必有红,有黑、白、红的语言未必有黄或绿,余亦可类推。颜色词的这种分布相当于语言类型学的蕴涵共性,即有标记的参项蕴含无标记参项的存在,但是无标记的参项未必蕴含含有标记参项的存在。如有 b、d、g 等浊音的语言必然有 p、t、k 等清音,有清音的语言未必有浊音;有名词复数标记的语言必然有单数,有名词单数的语言未必有复数标记。因此颜色词在语言和认知系统中并非任意分布,而是有其深层共性机制的,即越靠近左侧的颜色词等级越高、越无标记,在语言中的分布越普遍,越容易被范畴化认知。

我国不同民族语言的颜色词系统均符合上述颜色词分布的制约共

性。例如汉语历来有青、黄、赤、白、黑“五色”的说法,最基本的颜色词“黑、白、赤、黄”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西周时出现“青(蓝/绿)、朱(红)、玄(黑)”,秦汉以后出现“蓝、紫”,(解海江 2008)而作为颜色词的“绿、灰、褐、棕”在东汉时的《说文解字》中尚未收录。藏缅语的基本颜色词一般也只有“黑、白、红、黄、绿/蓝(绿、蓝用一个词表示)”5个,最复杂的颜色词语言是西夏语,但表示的基本颜色词也只有“黑、白、赤、黄、青、紫、灰”7种。(聂鸿音 1991)一项包含更多民族语言颜色词的研究也表明,“黑、白、红、黄、绿/蓝”是汉藏语言普遍分布的5个颜色词,在此基础上还可能有“紫、灰、青、蓝靛”等分布不普遍的颜色词。(罗天华 2009)阿尔泰语系不同语族语言的基本颜色词数量一般要略多于汉藏语,通常都有“黑、白、红、黄、绿、蓝”,有的语言还有“棕、紫、灰”。

颜色词的分合在人类语言中也呈现多样性。以“绿和蓝”、“红和黄”的分合为例,上述世界诸语结构类型分类的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区分绿和蓝的语言有30种(25%),不分绿、蓝的语言有68种(57%),不分黑、绿、蓝的语言有15种(13%),其他类型的7种(5%);区分红和黄的语言有97种(82%),不分红和黄的语言有15种(13%),其他类型的7种(5%)。区分“红和黄”语言的数量是区分“绿和蓝”语言的3倍多,说明人类语言中等级靠前的红色和黄色的范畴认知远远高于等级靠后的绿色和蓝色的范畴认知。

三 颜色词的词源分析

颜色范畴分类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活动,因此颜色词构成人类语言的基本词或核心词,例如在国际语言学界公认的最稳定的 Swadesh 100个基本词表中,即包括“黑、白、红、黄、绿”5个颜色词,这些基本颜色词的词源不仅是确定语言之间同源词或借词的重要词汇依据,同时

也可以反映颜色词发生的时间顺序,即同源颜色词要早于借用颜色词的发生时间。

(一) 汉藏语系

汉藏语系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 4 个语族语言的基本颜色词为“黑、白、红、黄、绿/蓝(青)”,见表 2。古今汉语共同的基本颜色词有 9 个:黑、白、红、黄、绿、蓝、紫、褐、灰,其中“绿和蓝”由“青”分化而来。藏缅、苗瑶、侗台语族语言标准的基本颜色词为“黑、白、红、黄、绿或蓝”五色。这 3 个语族颜色词系统通常是多源的,如苗瑶语族苗语支语言一般为本族词,瑶语则多借汉语;侗台语族和南岛语是底层语言关系,壮傣、侗水语支语言受汉语影响较深。诸汉藏语颜色词的词源可以反映颜色词发生的时间顺序,符合上述伯林和凯提出的“黑/白>红>黄/绿>蓝>棕>紫/橙/粉/灰”人类语言颜色词普遍的发生顺序。

(1) 黑

藏缅语各语支的同源词可构拟为**nak*,景颇语的 *tʃaŋ*³³ 疑似为汉语借词“青”**shle:ŋ* 或“苍”**sha:ŋ*(汉语“青或苍”可表“黑”义)。

苗语支同源,构拟为**qljuəŋ*¹;瑶语“黑”及苗语支“黑暗”同源,构拟为**qljak*⁷,疑似汉语借词“黠”**gri:d*。

侗台语族诸语言同源,构拟为**ʔndəm* 或**q-dam*,据认为和上古汉语的“黠”**lhu:mʔ*、“黠”**ʔl'u:mʔ*、“黠”**ta:mʔ* 有关,更深的底层应来自南岛语,如南岛语“黑”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ma-qitem*、印度尼西亚语 *hitam*、卑南语 *ʔuɖəɖəm* 等。

(2) 白

藏缅语的羌、彝、载瓦、景颇诸语同源,可构拟为**phruʔ*;藏语 *ka*⁵⁵ 和门巴语等藏语支其他语言同源(构拟为**kar*),可能与“星星”**s-kar* 同根。